

史學研究的標籤暴政

• 柯 文 (Paul A. Cohen)

先容我感謝《二十一世紀》的編者給我機會評論林同奇教授的書評。並不是每位歷史學家都能交上好運讓自己的著作得到具有洞察力和透徹的分析，而且，不止於此，還能看到這些著作被精當地和具有說服力地放在當時的更加廣闊的史學思潮中加以考查。史學家自己當然無法做到這點。要做到這點不僅需要一種局外人的視角，同時如果可能的話，還得加上一種局中人的同情的理解。林同奇正是為我做這件事的理想人物。因為他或許比任何人都更能發揮將局外人與局中人兩者結合起來的優勢。差不多二十年前，林教授把我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譯成中文。在整個翻譯過程中我和他密切配合。從此以後，我們經常聯繫，並有許多機會討論大家的工作，或一起泛論歷史。因此，儘管他當然並不完全同意我的意見，或未必感到我的意見具有說服力（請看書評中註釋⑳），但是，他對於我一般地如何思考問題，具體地如何思考歷史問題，所知卻甚為親切。這一點可以從他在書評中對我寫文章時遣詞用字的細微差別所具有的敏感性上看得很清楚。例如，他指出我只說「過去是難以捉摸的」，並沒有說「過去是不可捉摸的」；我只說「史家所創造的歷史和當初人們所創造的歷史實際上根本不同」，並沒有說兩者「完全不同」，而他強調前後兩種提法之間是有差別的。又如，他頗有灼見地抓住我的根深柢固的對理論的戒心，並指出作為一位史家我往往會偏重實踐甚於理論，甚

林同奇或許比任何人都更能發揮將局外人與局中人兩者結合起來的優勢。他指出我只說「過去是難以捉摸的」，並沒有說「過去是不可捉摸的」；他頗有灼見地抓住我的根深柢固的對理論的戒心，並指出作為一位史家我往往會偏重實踐甚於理論。

至當我所討論的是理論性的問題時也難免如此（參看書評中註釋㉑）。

當我通讀林的文章時，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思維的清晰以及他在建構自己的理據時所採用的有系統的方式。我還注意到他如何（就像今日的司馬遷）寬厚優雅地把最擊中痛處的一些批評放在註釋中（對這些註釋許多讀者難免要跳過不讀），而不是把它們放在正文中讓所有讀者都可看到。我對他研讀西方史學和史學理論範圍之廣泛也備感欽佩。這些理論中有一部分比較抽象，而且相當難懂。他把我和懷特加以比較，這使我感到過獎。儘管我和懷特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意見相左，但他是公認的近年來西方史學的巨擘之一。

我想對林的主張之一稍加修改。他十分正確地指出有些中國的評論者把我的史學思想中某些方面判定為後現代主義的影響，而實際上這些思想我早在三十年以前的著作中已經提出，同時他還敏銳地指出，通常被劃歸為某一特定學派（這裏指的是後現代史學）的思想並不一定是這個學派所獨有的財產。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想指出林在探索史華慈對我的思想的影響時，在某種程度上卻陷入了同樣的陷阱。這是因為當我在芝加哥大學念本科時，我遇到了好幾個老師，他們在我從未見過史華慈之前就讓我接觸到了後來史華慈又加以強化與深化的若干觀念。追溯影響這件事（正如史華慈自己時常說的）壓根兒就是一件捉弄人的、極其難以確定的事。從反

面去說明某人沒有受到某些影響(像林想說明我的著作沒有受到後現代的影響),相對而言還比較容易,但是要從正面去說明他受到了某些影響(像林想說明史華慈對我的影響)則比較困難。不過,關於後者,我得趕緊補上一句話,那就是我非常樂於承認史華慈教授在範圍廣泛的許多問題上對我的作用或影響(而且在我看來,這些問題都是最為重要的問題),諸如我們應該如何去思考過去,如何去提出歷史問題,以及如何才能察見那種在初看上去使人失去警惕的、貌似簡單的現象下面隱藏着的複雜性。

關於思想影響的複雜情況還使我們聯想起林文的另外一個主題,即他在文章開端和結尾時都提到的兩極成雙的術語「之間」(between)和「之外」(beyond)的區別(「之外」在此是指不能完全被控制或被管制住之意)。依我判斷,這種區別是貫穿林文的最重要思想之一。我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曾提到早在1974年出版的有關王韜的思想傳記的那本書,我談到王韜也許曾經超乎傳統/現代這種兩極對立「之外」。我這樣說時主要是感到這類兩極對立的概念實在太僵死,太不靈活,其範圍也太受局限,以至不能涵蓋像王韜這類人的全部思想。應該說,王的思想中有些一直就是「現代的」,另一些肯定是很「傳統的」。可是,還有一些思想儘管極為重要,卻既不能心安理得地稱之為現代的,也不能心安理得地稱之為傳統的。當我們把諸如「傳統」和「現代」之類思想強加在一個人的思想(或者強加在任何歷史現象)上時,我們的目的是想從眾多資料所呈現的混亂狀態中產生出秩序和清晰來。但是,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卻時常會忽視了為此而付出的過份簡單化和歪曲(當初經驗)的代價。

林明言或未明言地在文中反覆討論的「現代史學」與「後現代史學」的二分

架構,就給我們提供了上述這個問題的另一例證。我們需要一些起組織作用的概念;沒有這些概念,我們根本無法寫歷史。但是所有這些概念本身的內部都布滿潛在的陷阱,對這些陷阱,我們必須有高度的敏感和戒心。林在論證他反對對我的著作鬆散地(在有些情況下是粗糙地)貼上後現代的標籤時,就卓越地揭露了這類陷阱之一,即上文已經提到的那種預設,這種預設認為如果一位史家支持一些通常被指認為屬於後現代的思想,則這種支持本身就足以說明這位史家的著作受到了後現代的影響。此外,林在談到現代史學和後現代史學二分架構的局限時還指出,如果有兩位史家,一位實際上認同後現代主義,而另一位明確地批評後現代的某些基本信念,但是兩人卻可能都把對「人文關切」的強烈承擔作為自己史學思想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因此如果我們過份專注於現代史學和後現代史學的對比,僅僅注意兩者之間的相異之處,就很可能終於導致將兩人共同分享的一些重要思想從自己的視野中排除出去。

有一點在我看來似乎是明瞭的,即林的分析不僅僅適用於我的著作。儘管我非常感謝在他的文章的每一頁中都可以發現他對我的史學思想的某種灼見,但是依我之見,這篇文章的更大價值還在於它一般地說提供了某種對付「標籤的暴政」(the tyranny of labels)的榜樣。沒有標籤我們根本無法去思考,但是,如果不認識標籤可以調皮搗蛋,作惡多端,我們就難以很好地去思考。林教授對這個問題的敏感程度和他處理這個問題的特有方式提供一個其他學者可以學習的榜樣。

林同奇譯、柯文校訂

柯文(Paul A. Cohen)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當我們把諸如「傳統」和「現代」之類思想強加在一個人的思想(或任何歷史現象)上時,我們的目的是想從眾多資料所呈現的混亂狀態中產生出秩序和清晰來。但是,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卻時常會忽視了為此而付出的過份簡單化和歪曲(當初經驗)的代價。沒有標籤我們根本無法去思考,但是,如果不認識標籤可以調皮搗蛋,作惡多端,我們就難以很好地去思考。